

《中外城市建设及发展史》教学改革的文化路径

向岚麟, 王静文

[摘要] 研究探讨了《中外城市建设及发展史》课程的教学改革,从城市的文化本质入手进行,提出了三条文化路径改革建议:首先,从文化视野理解城市内涵,在教学内容上既包括传统教学所授内容,即城市的经典规划图示和杰出建设成就的形成背景及发展,又包括城市的布局结构和规则制度与不同阶层市民生活方式之间的互相影响和塑造过程,展现城市文化的形成;其次,在考虑可比性的前提下,采取横向区域与纵向时间的比较方法展现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异质性;最后,借助文化地理学构筑教学的理论框架,描述和理解城市之间的时空分异。通过文化路径的改革,促进知识融会贯通,拓宽学生视野。

[关键词] 《中外城市建设及发展史》;文化路径;教学改革;文化地理

[文章编号] 1006-0022(2014)11-0132-05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识码] A

Educational Reform Of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Urban Construction/Xiang Lanlin, Wang Jingwen

Abstract On reform of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Urban Construction course, the paper raises three cultural approaches. First is understanding city from cultural viewpoint. The curriculum shall include traditional content such as classical planning graphics and achievements, and also lifestyle of different times under different institutions. Second,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mparison shall be included to reveal commonness and uniquen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Last, cultural geography method shall be used to establish the theoretical frame to describ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ities.

Key words History of urban construction, Cultural approach, Teaching reform, Cultural geography

《中外城市建设及发展史》(以下简称《城建史》)作为城乡规划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对于深化学生专业知识、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有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的城市规划专业自诞生之初,即被归于工学学科体系下的建筑学分支,其应用型学科的定位导致了其专业教育体系偏重于工程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因此,《城建史》课程的教学内容也一直偏重于历史城市空间的建设情况和成果展示。

2013年,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达53.7%,意味着我国已经全面进入城市化时代。随着全球化、现代性进程的展开,如何突显城市个性与特色成为了城市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历史和文化作为城市的软实力,日益成为21世纪的城市

核心竞争力之一,“建构与挖掘‘城市文化资本’,进而建设伟大的城市文化,这应该作为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1]。

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城建史》教学日益显出不适应性,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改革以应对新的城市发展需求。

1 《城建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传统的《城建史》教学在功利化的专业教育思想导引下存在诸多问题。长期以来,《城建史》的授课方式一般是分述我国部分与外国部分的内容,按时间先后顺序讲述城市建设情况和规划理念;不同学科背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TD2011-32)

[作者简介] 向岚麟,博士,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城市规划系讲师。

王静文,通讯作者,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城市规划系副教授。

景的教师会自由地改变讲授重点,但由于长期受到工学学科体系下的大建筑学思想的影响,按照工程师培养模式进行的教学目标仅关注技术性及应用性,在教学上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 单薄。在教学内容上过于侧重城市物质形态的建设状况,既缺乏对城市建设所处时代社会经济背景的交代,又缺乏对与城市同期的相关经济、政治制度的沿革及变迁的探讨,以及对城市人文社会风貌的解释,使教学内容变成“无人化”的城市形态史。

(2) 断裂。由于时间和地域跨度较大,所涉及的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城市的形态和建设情况之间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内容庞杂且简单罗列,给学生以机械拼凑之感,留下的印象是割裂的空间、拼贴的历史。

由于以上问题的存在,《城建史》的教学内容庞杂、关系散乱和缺乏整体感,给学生留下了面面俱到却犹如一盘散沙,且内容粗浅的印象。因此,急需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教学理论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教学改革。

2 文化途径下的《城建史》教学思路与方法

教学的改革需要回到城市的本体上来。城市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早期的树居、洞居、穴居到造屋定居,从分散的聚落到集中的城市聚居,是文化,即人类文明的发展促进了这一形态的出现。城市不仅是空间的集合体,还是表面的物质堆积,积累和蕴含着本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人文遗产。对单个城市而言,它具备“形象指南”的作用,讲述所在地的现实生活和历史记录;而城市总体则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和标志^[2-3],展现人类的文明发展进程。城市不但是文化的容器,更是文化的孵化器,文化贯穿城市发展

的始终,并且能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构成城市间的横向联系。

城市文化有两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二是观念层面^[4]:物质层面的文化具有直观性;观念层面的文化着重指“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其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5],城市文化纵向的历史传承和横向的传播交流,其核心内容都在于观念层面。因此,只有观念层面的文化被人所理解,城市的本质才能被人所认识,人们才能掌握城市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动力,城市文化纵向的历史传承和横向的传播交流之间的桥梁才能得以构建。

对《城建史》教学而言,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城市形态往往是当时的社会制度与思想文化背景的物质反映,兼具物质和观念两个属性。但在实际教学中,人们往往舍本逐末,城市的这一本质内涵总是被忽略。如果《城建史》的教学能从城市的本质内涵——文化入手,不仅能抓住城市的核心本质,还能在各部分内容之间建立内在关联性,有效串联起各个时代不同地域的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从而激发学生探究城市发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表现的兴趣,既有利于学生掌握本课程所要求的基本内容,又有利于学生理解和熟知相关的人文知识,进一步地与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可见,《城建史》的教学如果从文化的层面切入,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1 从文化的视野理解城市的内涵

文化的概念其实非常宽泛,有学者整理出了160多种不同的定义^[6]。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追溯了文化概念的发展过程,并对其进行了全面总结,梳理出文化在使用中的三个相对独特的

意义:

(1) 艺术及艺术活动,常用来描述“音乐、文学、绘画和雕塑、戏剧、电影”的词语,在更广泛意义上被认为涉及“有教养的”人们所从事的“优雅的”消遣。

(2) 通过社会习得的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符号的特质,即文化建构了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含义体系和行为方式,是人们生活的社会母体环境。

(3) 作为发展过程的文化^[7],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习得文化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而且文化自身也总是在变化和发展中。

上述文化的三种意义常常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中得以研究,如第一种通常是人文学者研究的领域,第二种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考虑的,第三种则通常由历史学家进行研究。对应于《城建史》教学中城市文化的视野,有以下三个层次的含义。

2.1.1 作为智力及艺术活动成果的城市文化

作为智力及艺术活动成果的城市文化包括:城市规划的经典图式,如《周礼考工记》中对理想的“天子之居,方九里,旁三门”的规定、古希腊的希波丹姆型制和文艺复兴的理想城市形态等;历史上城市的经典建筑、园林及广场空间等,如古希腊的雅典卫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广场、唐长安的大明宫和宋东京的艮岳等。作为城市建设中的艺术作品,这些有形或无形的遗产具有典型的形式和最直接的感染力,更进一步的,它们同时反映了当时的统治阶层对空间文化意义的认识,决定了其对空间的主导性选择模式,如《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我国理想的城市形态是与“华夏”观和以“中”为尊的方位观一脉相承的。同时,《周礼考工记》一书的出现时间也与王莽篡汉以后初临天下以文化“安内”的目的不无联系,此书可以看作是其在空间秩序上的规则制度。

2.1.2 作为发展过程的城市文化

在中世纪晚期,文化的最早含义是指庄稼的种植和动物的饲养,稍晚被用来描述对人的心智的培养,后来具有了人们用来关注个体能力发展的含义,强调“培育”本身普遍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过程^[8]。对城市而言,无论是每个城市本身,还是某种城市设计理念或城市理论,都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因此,在《城建史》的教学过程中,应注意某个或某类城市形态的演变和发展,适时进行演变前后的总结和对比。在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围内,这属于文化传播的问题,同时涉及时间与空间的演变过程。例如,隋唐长安坊市制的形成就是在西汉长安、东汉洛阳、曹魏邺城和北魏平城等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的;到了元明清时的北京城,这种形式达到了顶峰。

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形式的发展程度要因时、因地而异,如坊市制在六朝隋唐时主要是在城市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出于登记城市户籍的需要;至明清时期,当时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与六朝隋唐时不可同日而语,明清北京城形成的坊市制形态主要是用于满足统治阶级维护政权之需,在城市规划建设上复归传统礼制。

2.1.3 作为特定生活方式符号的城市文化

芒福德曾经强调,在城市这个文化容器中所承载的生活比这容器自身更重要^[2]。文化作为特定生活方式的符号,在《城建史》领域中可以通过以下两层含义来理解。

(1) 城市是人们的聚居之地,人们在城市中的活动包括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且都必须占用一定的场所空间,如市场、街道、坊巷、广场和宫殿等。这些空间不仅具有功能性的作用,还是文化性的空间,与特定的使用者、使用规范甚至国家制度密切相关,即城市的布

局结构和规则制度。由统治者制定的各项经济、教育和礼仪等社会制度,当其普遍被人们接受,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保留下来时,便与城市形态共同作用于城市中的居民,造就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与芒福德所说的“城市能够促使人类经验不断化育出有生命含义的符号和象征,化育出人类的各种行为模式,化育出有序化的体制、制度”^[2]不谋而合。

具体而言,封闭的坊市制和开放的街巷制不但在城市形态上迥异,也与城市管理制度紧密配合。坊门、城门的开闭既对人们的日常活动在空间上有所限制——市场交易局限于“市”,居住必须在“坊”,也对其在时间上进行了规定,如李贺的《官街鼓》所述“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反映了唐长安“天将明,擂鼓三千声坊市门启;日暮,鼓百而门闭”的城市管理制度,统治者以此对百姓生活进行控制管理。到了宋代,封闭的坊墙与管理制度难以阻挡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发展,于是“弛夜禁”、“废市印”与“破墙开店”形成的街市格局相辅相成,共同催生了宋代的开放型城市。到了明朝,统治者恢复古典时期的礼制,在城市建设上将高高的鼓楼立于城市中心的十字街口,从视觉和听觉上对人们进行社会生活控制,而“晨钟暮鼓”也由此成为当时城市居民的作息时间坐标。

(2) 城市作为人的活动场所,而人本身是有身份差异的,具有性别、阶级和民族等方面的区分,是社会的产物,由此也带来空间的差异。例如,汉帝国分裂后的城市出现的两大特点:一是城市近郊大庄园的发展;二是城市中私家园林的兴起。这种特点的形成与当时的主要社会群体——士大夫密切相关:源自于战国时期的“游士”经过汉代三四百年的发展成为“士大夫”,追求“个体自觉”^[9]的“士”借由文学、音乐和山水欣赏投射内心的自由,园林由此成为

了这一精神的载体。

此外,在历代城市中,州县级以上行政城市几乎都设置中轴线,位于中轴线上的空间主要由皇室宫殿(或地方衙署)、钟鼓楼、广场和城门等组合而成,或由坛庙等左右对称排列烘托而成。而这中轴线空间几乎不具备实际的使用功能,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象征功能,是仅能由最高地位者(如皇帝)行走、停留和使用的空间。当空间符号的分布和使用规则成为通行规则,就成为一个文化认同的标识。

以文化的视角理解城市内涵,意味着既要掌握城市的经典模式和城市建设成果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背景,又要前后融会贯通,理解城市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和发展,厘清其来龙去脉,把握其在城市建设史上的特定地位。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除了要让学生从建设者的角度关注宏观的物质层面的城市建设状况,更要从使用者的角度去理解城市的空间形态和城市规章制度如何影响不同阶层人群的日常生活,以及由此塑造出的独特城市文化在时间的长河中如何延续或断裂。

2.2 通过比较的方法展现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城市异质性

通过文化的视角审视城市起源、发展、衰落的原因和结果,比较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城市的进程,既能总结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能揭示出文化传播的方向和路线,因此在教学章节编排上要注重多向维度比较的方法。

无论是考察城市中的典型建筑,还是研究人们的生活方式,都是从城市内部对城市进行剖析。而要看清城市,还需要外部的参照,“一个城市只有同它之外的东西进行对照才能认清自己的容貌和气质”^[10],通过对比,可以探索城市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例如,东方汉帝国和西方古罗马帝国,在对外武力

征伐扩张领土、修筑长城和方形军城方面极其相似，在都城大兴土木广建华美殿宇方面也如出一辙，突出了中央集权国家彰显帝国强盛与皇帝功绩的强大实力和意愿，但在新建殿宇的使用性质上却大相径庭：汉长安大半被皇家宫殿占据，而古罗马城却出现了大量公共建筑（如斗兽场、剧场和浴池等），这展现了东西方帝国城市在建设重点上的差异，反映了同一阶段东西方城市文化的不同层次^[11]。

此外，通过比较还能展示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情况。城市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国古代城市早在汉唐时期，就已经与亚欧其他国家有商业贸易及政治外交等往来，这也在城市的物质形态及城市生活中有所体现，如隋唐长安与日本的平安京、平城京，以及韩国的新罗庆州等在城市形态上具有高度相似性。通过城市比较可以得知不同历史时期中外交的水平 and 状况，以及城市异质性文化的来源之一。在《城建史》的教学中，比较的对象既包括上述的城市不同历史时期的比较，又包括中外城市的比较，还包括城市与乡村的比较，因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乡村的变化密不可分，而城市的概念也源自于与乡村的比较。

应当注意的是，当涉及中外城市间的比较时，不是任意城市皆可比较，必须是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同时需要对时空进行限定，如果用双方社会的发展形态都极为特殊的时代，或随意将城址所在地形条件差异极大的城市进行比较，只会得到“越比较异质性越大”的结果，而这样的比较结果是没有意义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可比较的时期和城市如表1所示。

2.3 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史论并重，架构《城建史》教学的理论体系

刘先觉教授在探索外国建筑史的教学

表1 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外城市文化比较

历史时期	时间维度	比较内容	城市文化可比性
早期城市起源时期	公元前	殷墟 vs 巴比伦 二里头宫殿 vs 希腊神殿 三星堆 vs 科萨巴德	祭祀宗庙与君主宫殿合一，主导城市；核心城市出现大型礼制建筑；城墙为圣界标识而非实用功能
集权帝国时期	公元0 ~ 5世纪	东方秦汉帝国 vs 西方罗马帝国	强盛的中央集权国家威服四海的建设途径相类似，表现在都城、建筑、长城和边界军城等方面
中世纪欧洲和封建制度走向发展中的中国	公元5 ~ 10世纪末	汉帝国解体与五胡乱华 vs 罗马帝国解体与哥特人入侵 隋唐长安、洛阳 vs 日韩平城京、平安京、庆州	游牧民族入主农耕区，对帝国文明的冲击和影响；坊市制形态和律令制制度
封建制度极盛时期	两宋时期	宋代经济社会变革背景下的城市变革 vs 欧洲封建国家经历新的起源与成长	城市以经济为主导，商业贸易大发展，出现以商业为中心的市镇；城市内部呈现以商业街、区为主的形态
工业社会前后	明清时期	欧洲绝对君权时期 vs 中国明清城市重建	城市的古典主义形态、广场及园林的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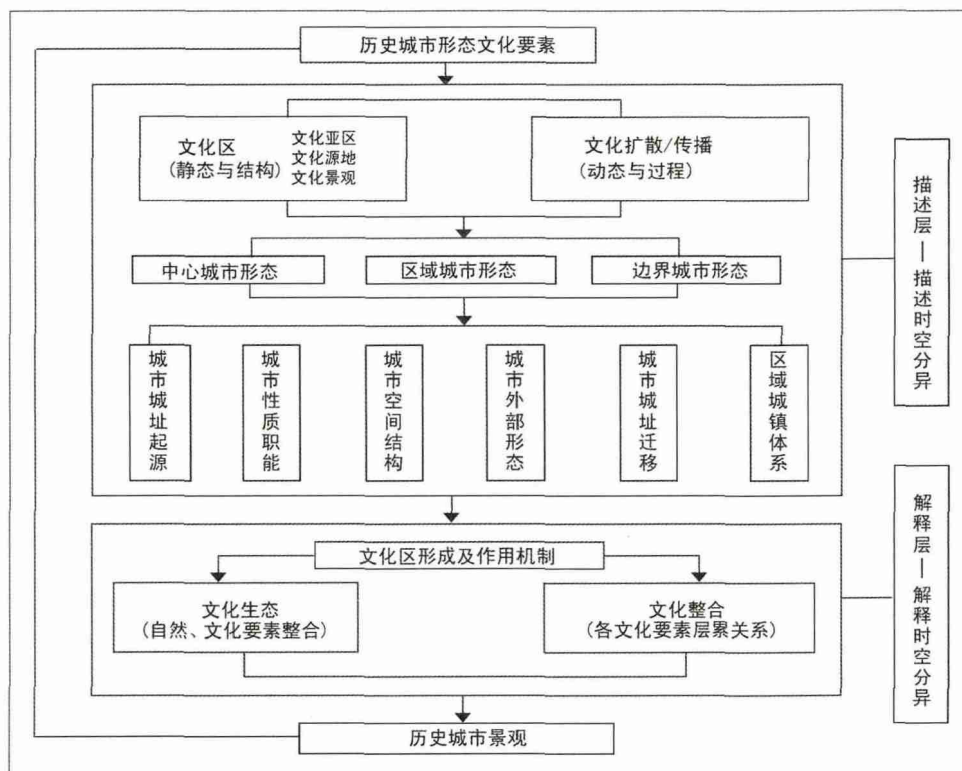


图1 《城建史》的文化生态学研究 / 教学框架

学时，提出“以史带论，论从史出”的观点^[12]，即加强建筑理论教学和研究的的要求，将有利于建筑师创作水平的提高。事实上，这一要求在《城建史》教学中更为适用。《城建史》内容繁多，由于学时与篇幅有限，往往容易“挂一漏万”：

一方面要在有限的时间内重点阐述；另一方面要注意在内容上涵盖相应的时间范围、空间范围，以及内容的系统性与典型性，如果没有理论体系的支撑，教学上容易给学生形成一盘散沙的印象。

城市作为一定地域的核心与节点，

它从产生到发展一直与周边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集聚及交流,这种集聚促进城市成长为一定地域的文化集结点和辐射点。文化地理学主要研究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各种文化现象的空间组合和演化规律,强调从地域角度出发探索文化现象的特性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着眼点在文化,重视文化的传播和扩散。因此,文化地理学为《城建史》的研究及教学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和手段,即文化的纵横分布规律既是文化地理学的切入角度,又可作为历史城市和城市历史的研究角度。其中,横向为空间分布规律,纵向为地理要素的层累关系,一般来说是研究环境、人、文化和社会等诸层面的作用关系,历史的时间过程常常在这一层面展开。在《城建史》的研究及教学中借助文化地理学的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框架^[13],可将授课内容如图1所示进行纵横展开。

在新的文化视野下,《城建史》课程从教学目标上不仅仅要求学生掌握各时期城市建设上的主要特点,更需要培养学生以联系、比较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城市在不同时空之下的共同点与差异性,厘清其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理解其变化的原因。如此,为学生展开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使其体会城市生活的意义,发掘城市文化的本质。

3 结语

历史造就城市文化,文化哺育城市未来^[14]。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科技化日益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化作为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特色的标识,更是城市吸引力之所在。“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3],并且“促使人类文明的生成物不断增多、不断丰富”。从文化的角度对城市建设和发展情况进行阐述,可以探寻出许多物质表象之后

的文化内涵^[15-16]。对学科教育而言,《城建史》的教学藉由文化的视角,能有效整合城市纵横方向的发展规律,将原本冗杂枯燥的知识系统化、条理化,使学生学习起来能够内外、前后全方位贯通,更易于记忆和掌握,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而更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通过文化视角的导入,开启文化的“慧眼”^[6],使传统规划设计类的学生更多一份人文的情怀,更添一层文化的思索,这是他们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感谢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的《中外城市形态比较》课程对本文的启发!)

[参考文献]

- [1] 张鸿雁. “城市文化资本”与“伟大文化”的建构[J]. 中国名城, 2009(3): 4-10.
- [2] 芒福德. 城市文化[M]. 宋俊岭, 李翔宁, 周鸣浩,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 [3] 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城市起源、演变和前景[M]. 宋俊岭, 倪文彦,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 [4] 约翰·R·霍尔, 玛丽·乔·尼兹. 文化: 社会学的视野[M]. 周晓虹, 徐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5] 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纳日碧力格,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6] 唐晓峰. 文化地理学释义[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2.
- [7] Williams R.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3.
- [8] 鲍尔德温. 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M]. 陶东风,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9] 余英时. 人文民主思想[M].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1.
- [10] 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 前言·城市文化读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1] 谷云黎. 文化视角的城市建设史[J]. 华中建筑, 2008(1): 22-23.
- [12] 刘先觉. 再论外国建筑史教学之道——教研结合, 史论并重, 开拓外建史教学新视野[J]. A+C, 2009(11): 66-71.

- [13] 李蕾蕾. 从新文化地理学重构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框架[J]. 地理研究, 2004(1): 125-134.
- [14] 何一民. 历史时空之城的对话[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8(6): 100-105.
- [15] 向岚麟, 吕斌. 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文化景观研究进展[J]. 人文地理, 2010(6): 7-13.
- [16] Cosgrove D, Daniels C, Mike. Cultural Geography[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收稿日期] 2014-02-12;

[修回日期] 2014-09-29